Aging Research 老龄化研究, 2026, 13(10), 738-745
Published Online October 2026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ar
https://doi.org/10.12677/ar.2026.1310815

Hans汉斯

老龄化视域下多元文化社区互助养老建设路径研究

韩延敏

南京林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生态文明传播学院，江苏 南京

收稿日期：2026年6月22日；录用日期：2026年10月22日；发布日期：2026年10月30日

摘　要

在我国人口老龄化持续加深与社区文化多元化程度不断提高的双重趋势下，部分城市社区已形成本土老年居民与外籍老年居民混居的多元文化格局，这对既有以同质性为默认前提的互助养老模式构成了新挑战。本文以积极老龄化理论为主线，结合社会资本理论与跨文化适应理论，系统分析了多元文化社区互助养老的建设困境：其核心障碍并非资源匮乏或制度缺位，而是跨文化交往成本过高，语言不通带来信息成本、文化陌生带来心理成本、规则不明带来试错成本，这三者共同抬高了老年人参与互助的门槛，而现有制度设计未能为消解这些成本提供有效支持。据此，从语言沟通辅助、宣传引导与心理建设、包容性活动体系设计、社区组织跨文化服务能力提升、长效保障与激励机制完善五个层面提出系统性优化路径，以期为多元文化背景下的社区互助养老治理提供参考。

关键词

老龄化，互助养老，社区治理，跨文化交际，多元文化社区

Research on the Construction Path of Mutual-Aid Elderly Care in Multicultural Communit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ging

Yanmin Han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College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mmunication, Nanjing Forestry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Received: June 22, 2026; accepted: October 22, 2026; published: October 30, 2026

Abstract

With the dual trend of deepening population aging and increasing diversity of community culture

文章引用: 韩延敏. 老龄化视域下多元文化社区互助养老建设路径研究[J]. 老龄化研究, 2026, 13(10): 738-745.
DOI: 10.12677/ar.2026.1310815

in China, some urban communities have formed a multicultural pattern of local elderly residents and foreign elderly residents living together, which poses new challenges to the existing mutual aid elderly care model based on homogeneity as the default premise. This article takes the theory of active aging as the main line, and combines social capital theory and cross-cultural adaptation theory to systematically analyze the construction dilemma of mutual aid for elderly care in multicultural communities: the core obstacle is not the lack of resources or institutional deficiencies, but the high cost of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the information cost caused by language barriers, the psychological cost caused by cultural unfamiliarity, and the trial and error cost caused by unclear rules. These three factors together raise the threshold for elderly people to participate in mutual aid, but the existing institutional design has failed to provide effective support for resolving these costs. Based on this, a systematic optimization path is proposed from five aspects: language communication assistance, publicity guidance and psychological construction, inclusive activity system design, improvement of cross-cultural service capabilities of community organizations, and improvement of long-term guarantee and incentive mechanisms, in order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community mutual assistance and elderly care governance in a multicultural context.

Keywords

Aging Population, Mutual Aid for Elderly Care, Community Governance, Cross Cultural Communication, Multicultural Community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人口老龄化是当前中国社会面临的最为深刻的长期性挑战之一。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 60 岁及以上人口为 2.64 亿人，占总人口比重 18.70%[1]。国家统计局 2026 年 1 月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 年末我国 60 岁及以上人口已达 3.2338 亿人，占全国人口的 23.0%，其中 65 岁及以上人口 2.2365 亿人，占 15.9%[2]。据预测，到 2035 年前后，我国 60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将突破 4 亿人，到 2050 年将达到 5 亿人左右 [3]。面对如此庞大且日益增长的养老需求，仅靠传统机构养老和专业居家养老是难以全面覆盖的。

在此背景下，互助养老作为一种低成本、高效能的社区养老模式日益受到重视。2026 年 4 月，《关于推进互助性养老服务发展的意见》(后文简称《意见》)[4]在国家层面对互助性养老服务作出明确定义，即通过邻里或村(社区)居民间的互相帮扶，为老年人提供自愿性、非营利性养老服务的活动，并规划了清晰的发展路线图。《意见》明确提出，到 2030 年，具备互助服务功能的城乡社区养老服务设施覆盖率不低于 70%。这标志着互助养老正式从各地自发探索走向国家战略的顶层设计。

与此同时，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程度不断加深和跨境人员流动日益频繁，来华旅居、定居的外籍银发群体逐年增多，部分城市社区已形成本土老人与外籍老人混居的多元文化格局。然而，现有互助养老实践大多默认参与者是同质的本土群体，对文化背景差异带来的交往障碍、活动设计冲突等问题关注不足。现有研究多聚焦资金、场地、人力等资源层面的制约因素，较少从跨文化视角审视多元文化场景下互助养老“推不动、融不进”的深层原因。因此，本文引入跨文化交往视角，分析多元文化社区互助养老的特

[1]https://www.gov.cn/guoqing/2021-05/13/content_5606149.htm
[2]https://www.stats.gov.cn/sj/zxfbhjd/202602/t20260228_1962662.html
[3]https://www.gov.cn/zhengce/202511/content_7049923.htm
[4]https://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604/content_7067394.htm

殊困境，并提出针对性优化路径，以期丰富积极老龄化理论在多元场景中的应用，为多元文化背景下的社区养老治理提供参考。

2. 理论基础

积极老龄化是指老年人在进入老年阶段后，仍能持续参与社会、经济、文化、精神和公民事务，并在健康、参与和保障三个方面均获得充分支持的过程。世界卫生组织(WHO)在 2002 年发布的《积极老龄化：政策框架》[1]中正式提出这一概念，将其界定为“尽可能优化健康、参与和保障机会的过程，以提高人们随着年龄增长的生活质量”。这一概念的重要贡献在于，它打破了传统观念中将老年人视为“负担”或“被照顾者”的刻板认知，将老年人重新定位为社会发展的积极参与者和贡献者。胡惠琴(2020) [2]进一步指出，“积极老龄化”的三个关键词——健康、参与、保障——随着时代发展不断被赋予新的内涵，需要在城市、社区、设施、住宅等不同尺度上提出积极的干预措施。而互助养老正是积极老龄化所倡导的参与理念在社区层面实现落地的一种切实可行的实践形式。

社会资本理论为理解互助行为何以产生和维持提供了微观解释。该理论认为，通过日常社交互动，邻里之间可以逐步积累信任、互惠规范和社交网络，这些社会资本正是合作行为得以产生和维持的基础。因此在老龄化社区中，老年人不仅是社会资本的接受者，更是社会资本的重要生产者，他们在维系社区信任与互惠网络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3]。而多元文化社区中，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老人之间由于缺乏共同的交往经验和共享的价值预期，社会资本的积累天然面临更高的门槛和更长的周期。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多元文化社区中的互助养老比同质性社区推进得更为艰难：不是因为人们缺乏善意，而是因为信任赖以生长的那套共同基础，如共同的语言、共同的交往规则、共同的预期等被文化差异切断了。

跨文化适应理论则进一步揭示了这种“切断”是如何发生的。该理论指出，不同文化背景的个体在长期接触中必然面临心理压力、沟通障碍和适应策略的挑战，文化差异会带来交往中的不确定性、焦虑感和误解风险[4]。换句话说，跨文化交往是有成本的，语言不通带来信息成本、文化陌生带来心理成本、规则不明带来试错成本。当这些成本过高时，人们最自然的选择就是回避交往。这正是多元文化互助养老面临的核心困境，即不是老年人不需要互助，而是跨文化交往的门槛把许多老人挡在了门外。

3. 多元文化社区互助养老的萌芽

近年来，在国家政策引导和地方实践探索的双重推动下，互助养老在全国范围内加速推进。杭州滨江区的“多代同楼”项目自 2019 年启动以来已延续六年，以陪伴服务换取免租入住的形式吸引了跨代人群参与社区养老；北京平谷区面对农村人口老龄化率高达 33.38%的局面，探索形成了以邻里互助为核心的乡村养老模式[5]；此外，“时间银行”“老伙伴计划”“邻里守望”等互助形式也在上海、南京、成都等城市广泛铺开。从整体上看，当前互助养老实践已覆盖城市社区、农村基层、代际合住等多种形态，积累了一定的制度经验和群众基础。在这些实践中无论是政策设计还是具体执行，大多默认互助养老的参与者是文化背景、生活习惯、语言能力基本相同的本土老年群体，因此活动策划、服务流程、沟通方式、激励制度都围绕同质化群体展开。对于多数社区而言，这一假设在实践中或许并不构成问题，因为社区内的老年居民确实以本土人群为主。但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程度加深和跨境人口流动日益频繁，来华旅居、定居的外籍银发群体逐年增多。在部分国际化程度较高的城市社区中，本土老年居民与外籍老年居民混居已非罕见现象。当社区老年群体的内部构成从同质走向多元时，以“同质性”为默认前提的互助养老模式能否直接移植到多元文化场景中，便成了一个需要审慎对待的问题。

现实中，部分社区已经开始回应这一挑战，并形成了初步的探索：成都市武侯区红牌楼街道丽都花

[5]https://www.ndrc.gov.cn/wsdwhfz/202606/t20260601_1405589.html

园社区，面积仅 0.45 平方公里，居住有归侨侨眷及侨属 357 人，社区老龄化率高达 17.8%[6]。工作室开设“双语课堂”，为外籍居民提供语言帮助，贾慧春老人既是成都方言的讲解者，也为侨眷提供英语翻译服务 [7]。2023 年，社区还推出了“漂流轮椅”共享项目，通过“居民自筹 + 社区补贴 + 公益捐赠”的方式解决侨属老人的出行难题 [8]。宁波文竹社区于 2024 年 6 月成立“乐活 • 银竹”中外联络员银发志愿服务队，成员为退休老教授、老社工、老干部，平均年龄 65 岁。他们或是教授中国文化，或是调解邻里矛盾，想方设法让这些外国邻居在文竹社区住得安心、舒心、暖心 [9]。

尽管多元文化场景下的互助养老已有现实基础，个别社区已经在语言服务、活动组织等方面积累了可供观察的经验。但也应当看到，这些实践仍处于零散、个案式的自发探索阶段：一方面，各社区的探索方向差异较大，尚未形成相对稳定的操作框架；另一方面，不同社区之间的经验交流和制度迁移尚不充分，多数多元文化社区在面对中外老人混居格局时，仍然缺乏明确的工作思路和方法指引。从个案经验到制度化方案之间，还需要进一步的理论分析和系统建构。

4. 多元文化社区互助养老建设难点

4.1. 思想层面的参与惰性

社会资本理论表明，邻里间的信任关系并非天然存在，而是通过持续、稳定的日常互动逐步积累的，信任是合作的产物，而非合作的前提。这意味着，社区社会资本的生成依赖于一个初始的互动条件：居民必须首先愿意走出私人领域、参与到公共交往中去。然而在多元文化社区中，这个初始条件的达成面临着特殊的困难。

本土老人长期生活在熟人社会中，其社交网络已形成相对稳定的边界和运行惯性，对圈子外的成员天然持有一种审慎态度。外籍老人则因语言不通、环境陌生而处于信息弱势地位，主动走出文化舒适区的意愿普遍较低。跨文化适应理论进一步揭示了这种双向回避的心理机制：个体在面对文化陌生情境时，因缺乏对交往结果的预期能力，会产生不确定性和焦虑感，而回避接触是最直接的心理防御反应。本土老人的保守与外籍老人的退缩，都是各自面对不确定性时的正常反应，但二者的叠加却形成了一个结构性僵局，双方都在等待对方先迈出第一步，而信任赖以生长的初始互动却始终无法发生。

4.2. 语言隔阂

跨文化适应理论将语言能力视为文化适应的核心变量，其重要性不仅在于沟通的工具性功能，更在于语言是个体在陌生环境中获取安全感的基本保障。无法理解周围的信息、无法表达自己的需求，会使个体持续处于高焦虑状态，从而倾向于回避一切非必要的社交场景。

在多元文化社区中，外籍老年群体即便具备基础的生活汉语能力，在面对健康咨询、活动规则说明、情感深度交流等复杂场景时，依然面临严重的表达与理解困难。这种语言能力上的局限容易使外籍老人在社交互动中表现出退缩和回避，而本土老人由于不了解对方语言能力不足的实际情况，往往将这些表现解读为“不合群”或“态度冷淡”，由此形成沟通失败之后的双向负面评价。

此外从服务供给的角度来看，绝大多数基层养老工作人员不具备外语沟通能力，社区通知、活动海报、安全提示等多以纯中文呈现。这种语言环境事实上构成了外籍老人获取服务信息、了解活动安排、表达参与意愿的制度性障碍。信息获取的不充分与表达能力的不对等，使外籍老人在互助体系中长期处

[6]https://www.gqb.gov.cn/news/2025/0717/60099.shtml
[7]https://e.thecover.cn/shtml/hxdsbsq/20251216/240185.shtml
[8]https://www.gqb.gov.cn/news/2025/0717/60099.shtml
[9]http://epaper.cnnb.com.cn/nbwb/pc/content/202604/18/content_272303.html

于边缘位置。

4.3. 文化隔阂

语言障碍是容易被识别的问题，而文化差异带来的交往规则冲突则更为隐蔽。跨文化适应理论指出，不同文化背景的个体在长期接触中必然面临沟通模式、价值取向和行为预期的差异，这些差异本身并不必然导致冲突，但会显著提高交往双方的理解成本——每一方都需要花费额外的心力去解读对方行为背后的文化逻辑，并调整自己的表达方式以避免误解。当这种理解成本过高时，参与者会逐渐退出交往。

在价值观念层面，本土老人受集体主义文化影响，倾向于在集体活动中寻求社交满足，认为频繁的走动和热闹的氛围是邻里关系的正常表现；而来自西方文化背景的老人更看重个人隐私和独立空间，对过度询问个人情况较为敏感。同样的行为，如询问家庭状况、表达关切问候等，在一种文化中被视为友善，在另一种文化中却可能被感知为冒犯。

在社交行为与沟通习惯层面，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在寒暄方式、人际距离、表达礼貌规则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本土老人习惯熟人之间近距离交谈、大声说笑，外籍老人可能偏好保持一定社交距离、语调温和。这些差异容易引发双向误解，本土老人觉得外籍老人“太冷淡、不好接近”，外籍老人觉得本土老人“太热情、没边界”。

在养老理念与休闲偏好层面，本土部分老人倾向于以家庭和集体为核心的晚年生活方式，外籍部分老人更注重个人兴趣爱好的发展。集体互助活动在时间安排、活动强度、内容类型上的设计难以兼顾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养老期待。

在习俗与节庆层面，饮食禁忌、节庆时间不一致等问题，使得集体聚餐、联欢类互助活动难以统一安排。例如，以端午节包粽子、重阳节包饺子为主要内容的本土节日活动，可能因外籍老人的饮食禁忌或文化陌生感而参与度不高。

4.4. 社区运营制度与配套资源短板

社区工作人员多为本土背景，普遍缺乏跨文化沟通的意识和经验，在组织中外老人共同参与的活动时，既缺乏对不同文化交往习惯的基本了解，也缺少应对文化摩擦的实践经验[5]。且现有活动策划存在明显的同质化倾向，主要以本土节日和本土习俗为核心内容，缺乏兼顾外籍老人文化习惯的混合型活动设计，也未能将文化差异与语言障碍作为活动设计的重要考量维度纳入常规工作。

目前互助养老的激励制度和纠纷调解机制主要面向同质性群体设计，因文化差异而产生的社交摩擦一旦发生，则会缺少有效的调解机制来澄清误会、修复关系。一次负面的交往体验在跨文化情境中产生的影响比在同质情境中更为持久，因为参与者倾向于将个体之间的不愉快经验泛化为对整个群体的负面判断。调解机制的缺失使得这种泛化风险无法得到有效控制，一些摩擦很可能使老人彻底放弃继续参与的意愿。

此外，语言辅助服务的欠缺，如简易翻译、多语种图文标识等进一步加大了外籍老人的参与门槛。有限的经费、场地等资源，在多元文化场景下因需要额外投入用于文化适配和沟通支持而更加紧张。这些制度层面的供给不足，使得思想层面的参与惰性、语言层面的信息障碍、文化层面的交往摩擦既无法得到预防性地消解，也缺乏事后修复的机制支持，多元互助养老因此难以形成正向循环。

5. 多元文化社区互助养老建设路径探索

正如前文所述跨文化交往是有成本的，而目前的互助养老模式没有为这些成本提供任何补偿或消解机制，只是简单地要求外籍老人自己适应。因此，优化路径的核心方向不是发明什么全新的互助模式，

而是在现有框架中嵌入一整套降低跨文化交往成本的机制。

5.1. 语言沟通辅助体系

语言辅助的本质是降低外籍老人获取养老服务和参与社交互动的信息成本，这是社区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应有之义。在有外籍人口居住的社区，应在养老服务中心、老年活动室、社区卫生服务站、小区主要出入口等关键节点，设置中英双语的指引标识，若社区外籍人口以某国别为主，可增设相应语种。标识内容包括开放时间、服务项目、紧急联系电话、活动通知等基本信息，使外籍老人能够独立获取养老服务的入口信息，减少因“看不懂”而产生的被动回避。

但标识只是基础，更重要的是人员的配备。社区应挖掘具备外语能力的退休教师、大学生志愿者、热心居民，组建一支“双语联络员”机动小组，联系方式公布在社区公告栏和活动室。在组织中外老人集体活动时，提前安排联络员到场提供口语辅助；在外籍老人遇到就医、办事等需要深度沟通的场合，提供电话或现场的翻译协助。如成都丽都花园社区的“银龄翻译官 ”既为外籍居民讲解成都方言，也为侨眷提供英语翻译服务。这一做法成本可控且可持续，其价值不仅在于解决语言不通的实际问题，更在于让外籍老人感受到被社区考虑到，从而降低心理上的隔阂感。

5.2. 宣传引导与心理建设

语言辅助解决的是“能不能沟通”的问题，但即便能沟通，如果老人不想沟通，问题依然无解。要打破这种双向回避，需要让双方分别看到跨文化交往的价值。

社区应通过宣传栏、邻里故事会、微信公众号等渠道，宣传跨文化互助的正面案例和积极意义，弱化“我们”和“他们”的标签意识，营造开放包容的社区氛围。具体做法上，可定期在社区公告栏张贴“中外互助小故事”，用真实发生在身边的案例打动老人；定期组织“邻里茶话会”，邀请已经参与互助的外籍老人和本土老人面对面交流感受，让犹豫观望的老人从同伴身上看到跨文化交往并不可怕。与此同时，社区还应在养老服务中心引入老年心理疏导服务，设立聊天角并由社工定期值班，帮助有需要的老人缓解跨文化交往中的紧张感和焦虑情绪。

更关键的是培育一批“跨文化互助带头人”，重点发掘那些性格开朗、有海外生活经历或外语基础的热心老人，给予社区荣誉激励。跨文化适应理论表明，在面对陌生文化情境时，看到与自己相似的人成功适应的经验，可以显著降低焦虑感。这些带头人就是社区中活生生的示范，他们证明了跨文化交往是可以的、愉快的，其说服力远超任何宣传材料。

5.3. 设计包容性互助活动体系

当老人“敢说话”“愿意来”之后，能否留住他们参与，取决于活动的设计是否对所有人都友好。为此，社区需要摒弃单一本土化的活动设计思路，开发兼顾中外文化习惯的混合型项目。

首先，打造“中外节日共庆”系列活动。在春节、中秋节期间，组织中外老人一起包饺子、做月饼，同时让本土老人了解外籍老人母国的重要节日，在相应节点开展联合庆祝活动。社区可提前在活动室张贴节日预告，通过图文展板介绍不同节日的来历和习俗，让双方在互相了解中消除陌生感。

其次，组织低门槛、高参与度的文化交流活动。如世界美食分享会——每位参与的老人自带一道拿手菜，附上简易食材说明，在品尝中自然展开交流；手工技艺交流日——本土老人教做中国结、剪纸，外籍老人教编织、绘画，这类活动为交往提供了一个中介物，老人可以在共同做一件事的过程中自然地产生交流，而不需要直面坐下来聊天的巨大心理压力。这实际上是把跨文化交往的成本降到了最低，老人们不需要找话题，手头正在做的事情就是最好的话题。

最后，设置轻互动、低压力的渐进式项目。从最轻松的“园艺结伴”“散步同行”“读书分享”入

手，让老人从低风险交往开始逐步建立信任，再慢慢过渡到更深度的互助内容[6]。不同文化之间既有摩擦，也有碰撞出精彩的可能，关键在于能否找到合适的切入点。活动设计中还应明确“自愿参与、不强迫交流”的原则，每次活动前征求老人意见，充分尊重不同文化背景下老人的隐私观念和社交边界。

5.4. 提升社区组织跨文化服务能力

社区各项活动的落地离不开社区组织的统筹和执行。活动设计同质化、缺少混合型方案、纠纷调解机制缺失等问题，根源在于社区工作人员缺乏跨文化服务的意识和能力。他们不是不努力，而是不知道怎么做，因为他们没有接受过相关培训，也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借鉴。

因此，多元文化社区应成立专项互助养老工作小组，指定工作人员作为“跨文化互助专员”，专门负责中外老人互助活动的策划、组织与协调。同时，对社区工作人员进行基本的跨文化沟通培训，培训内容应务实可操作，涵盖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基本社交礼仪、常见文化禁忌、以及如何识别和化解因文化差异产生的小摩擦。

在此基础上，社区还应建立双向匹配机制。工作人员可以通过入户走访或电话访谈，摸底中外老人的兴趣爱好、性格特点及参与互助的意愿程度，以此精准撮合有共同爱好的老人结成 2 至 4 人的互助小组，避免因配对导致的不愉快。

5.5. 健全长效保障与激励机制

如果互助只是单向付出而没有回报，如果跨文化交往中发生了误会却没人调解，那么即使一开始热情高涨，也难以持久。因此需要健全保障与激励机制。

在积分激励方面，应完善互助养老的积分管理制度，明确“做什么事、积多少分、换什么服务”。例如，陪不同文化背景的邻居去医院看病积 5 分、教一项手工技能积 3 分、参与一次集体活动积 1 分，积分可兑换家政服务、社区食堂餐券、生活用品等。每半年评选一次“互助之星”，对积极参与的老人给予公开表彰和适当物质奖励，调动长期参与的积极性。

在矛盾调解方面，应建立跨文化互助矛盾调解机制。当因文化差异产生误会或冲突时，由“跨文化互助专员”第一时间介入，邀请双方坐下来沟通，帮助解释文化背景、消除误解。可制作一份跨文化互助常见误会小册子，列举容易引发矛盾的文化差异场景，提前让参与互助的老人有所了解，防患于未然。此外，对于外籍人口较多的社区，也可建立外国人矛盾外国人解决的制度，让外国人参与到所属社区协调班子中，解决外籍人口之间的矛盾。

6. 结语

在人口老龄化持续加深与社区文化多元化程度不断提高的双重趋势下，多元文化社区的互助养老不能简单复制同质性社区的经验。多元文化互助养老的核心困境在于跨文化交往的成本过高，语言不通、文化陌生、规则不明等共同抬高了老年人参与互助的门槛，而现有制度设计没有为消解这些成本提供任何支持。基于这一判断，本文从降低跨文化交往成本的角度提出了五条路径，分别对应语言辅助、心理建设、活动设计、组织能力和制度保障五个层面。五条路径之间存在清晰的递进关系：语言辅助让沟通成为可能，心理建设让老人愿意尝试，包容性活动让尝试产生愉快体验，组织能力提升让活动可持续，制度保障让参与有回报、矛盾有出口。只有当这些条件都具备时，多元文化社区中的互助养老才能从形式上的共存走向实质上的共济。

参考文献

[1]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Active Ageing: A Policy Framework. Geneva: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02.

[2] 胡惠琴. WHO “积极老龄化”政策框架的新解读[J]. 城乡规划, 2020(3): 43-49.

[3] Heenan, D. (2010) Social Capital and Older People in Farming Communities. *Journal of Aging Studies*, **24**, 40-46.

[4] Berry, J.W. (1997) Immigration, Acculturation, and Adaptation. *Applied Psychology*: *An International Review*, **46**, 5-34.

[5] 刘欣, 王冰. 社区异质性与社区社会资本: 理论争辩与中国议题[J]. 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6, 68(1): 158-168.

[6] 明艳, 李悦华, 杨洁, 等. 情感聚融与文化内生: 休闲共同体老年日间照料模式研究[J]. 人口研究, 2025, 49(6): 100-112.